

# 世界教育强国的形成与发展

## ——以英、法、德、美为例

高书国

**[摘要]** 教育强国是教育综合实力、培养能力、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具有突出地位和强大影响的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是世界教育强国,各自发展历程不同而又殊途同归。因其文化同根、价值同源,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相近性;因其历史背景、国家利益不同,表现出差异性、多样性和竞争性。以历史脉络为线索,结合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及各国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和关键事件,从教育强国形成的核心要素、实践路径、演进机制和典型经验四个维度,从前期酝酿、集聚能量、创新成长、实现超越四个阶段,对教育强国形成演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典型经验、战略优势和风险应对进行深度研究分析,探寻揭示教育强国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学理逻辑和未来逻辑,以期更加准确科学地把握教育强国形成演进的规律特点和追求卓越的未來向路,为加快建成中国式现代化教育强国提供经验与模式借鉴。

**[关键词]** 教育强国;形成机制;典型经验;竞争趋势

**[作者简介]** 高书国,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特聘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研究员(北京 100084)

教育强国是教育综合实力、培养能力、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具有突出地位和强大影响的国家。世界教育强国具有世界级教育发展水平和能力,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担当重要角色,在世界教育发展中发挥先导和引领作用。教育强国成长是一个复杂、非线性、成败与起伏交错的演进过程,有其内在政治逻辑、经济逻辑、文化逻辑和教育逻辑。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教育强国,因其文化同源、价值同向、制度同质,形成经历、演进发展和典型特征方面具有许多相同性或相近性;又因其资源禀赋、教育历史、各自利益和领导能力各不相同,又呈现出差异性、多样性和竞争性,对其进行科学分析,既有深刻的理论价值,更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 一、殊途同归:世界教育强国的多种实践路径

教育强国是一个历史性比较概念。世界强国包括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资本主义诞生以及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特别是产业变革、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浪潮等重要历史变革,都对国家生命周期的演进产生历史性的重要影响。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到21世纪知识经济发展,跨越数百年,先后产生了以英、法、德、美为代表的世界教育强国,既推进了其自身教育发展和经济发展,也探索出多种教育现代化的国家道路。教育强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曲折艰辛又富有挑战性。总体而言,英、

法、德、美四个发达国家的教育强国建设可以划分为“前期酝酿、集聚能量、创新成长、实现超越”四个阶段。

#### (一) 英国:工业革命催生教育强国

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也是第一个国家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探索者和先行者。1649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在威尔士设立免费学校。与早期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相伴,历经长期曲折探索,英国于18世纪60年代,创办了星期日学校(Sunday School)和导生制,逐步建立了适应工业化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初等教育体系。英国政府借鉴吸收法国教育家拉伯雷(Rabelais, F.)、蒙田(Montaigne, M. D.)以及英国教育家埃利奥特(Elliott, G.)、培根(Bacon, F.)、夸美纽斯(Komensky, J. A.)、弥尔顿(Milton, J.)和佩蒂(Pettie, J.)的教育思想主张,在全国创办称之为“学园”的新型学校。

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为欧洲发展注入不可阻挡的推动力量,英国工业体系和城镇体系迅速成长。1700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简称GDP)是荷兰的2倍,到1820年,则相当于后者的7倍。<sup>[1]</sup>1860年,英国制造业占世界总额的近20%,航运量占世界40%以上。从更长的历史周期分析,1600—1947年,英国总人口增长8.0倍,经济总量增长51倍,人均GDP增长5.5倍,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强国。

1833年,英国国会通过《教育补助金法案(Education Grant Act)》,在英国开启了国家间接干预教育的先河。1870年,英国6~10岁的入学率只有40%。《1870年初等教育法(1870 Elementary Education Act)》旨在建立公立的初等教育制度。1871年,英国政府实施了初等学校强迫入学制度。1880年,实行5~10岁阶段的义务教育;1893年,延长至11岁,1899年,延长至12岁。1891年,英国全境完全实行免费初等教育,其中公立学校在校生人数占54%。1902年,英国《教育法

(Education Act)》颁布,公立中学制度在英国全面建立,与法国和普鲁士两国相比,晚了将近100年。

在英国教育发展历史上,《1944年教育法(The Education Law of 1944)》被称为其教育制度改革进程中,极其重要的教育法令和最完整的教育法律框架,义务教育年限从原先的9年(5~14岁)延长为10年(5~15岁),有条件的地方实施11年(5~16岁)义务教育,英国成为世界义务教育年限最长的国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富足的经济促进了教育公平和教育发展,劳动力受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大幅提升,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和教育强国。

英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悠久。中世纪到工业革命前的“古典大学时期”,涌现了英语世界中以牛津大学(1168年)、剑桥大学(1209年)和爱丁堡大学(1583年)为代表的最古老大学。19世纪60年代的“红砖大学时期”(Red Brick University Period),建立了以曼彻斯特大学、伯明翰大学、利物浦大学为代表的一批技术大学;20世纪60年代的“平板玻璃大学时期”(Flat Plate Glass University Period),创办了约克大学、萨里大学、巴斯大学等一批新型大学,<sup>[2]</sup>形成了制度完备且质量领先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教育强国地位提供有力支撑。

英国高等教育长期坚持精英教育的发展策略,普及水平过低严重制约和影响着英国教育强国地位的巩固和作用的发挥。1963年,《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的发表,成为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分水岭,该报告也成为英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重要里程碑。但是,由于70年代初期“石油危机”,经济社会发展延缓,英国高等教育规模与入学率长期处于徘徊阶段。

面对21世纪全球激烈的教育竞争,1991年,英国政府同时发布《高等教育的框架——英国高等教育白皮书(The Framework for Higher Education——UK Higher Education

White Paper)》、《21 世纪的教育和培训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21st Century)》和《入学途径和机会:教育和培训的战略 (Access Approaches and Opportunities: Strategies f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三份教育战略报告,并表示:“我们正在走向 2000 年,我们的目标是达到每三个人中,便有一人受到高等教育”<sup>[3]</sup>。从精英发展模式转变为普及发展模式,是英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大转型。借由 1984—1995 年英国学龄人口规模下降 30% 的机会,在知识经济社会的动力驱动下,英国加快高等教育发展步伐,毛入学率从 1990 年的 29.1% 跃升到 2000 年的 60%。一个老牌精英教育国家在知识经济动力推进下,再一次实现了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

进入 21 世纪,英国政府所实施的各项教育规划与政策,核心追求是持续保持政策力度,增强教育强国的竞争力和影响力。2004 年,英国教育与技能部发布名为《置世界于世界一流教育之中:一项教育、技能与儿童服务的国际战略 (Putting the World into World Class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Education, Skills and Children's Services)》的国家教育发展战略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英国未来十年的国际教育战略目标与基本政策。同年,英国教育与技能部发布的《英国教育改革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UK)》白皮书,提出“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教育改革总目标。2007 年 10 月,布朗首相发布了新政府的教育施政纲领,提出:“英国的抱负是建立‘世界级’的教育体系,成为全球教育联盟的领头羊。”英国《儿童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Children's Program——Create a Brighter Future)》十年规划进一步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力争实现 90% 的小学入学新生在所有方面都发展良好,90% 的初中毕业生在普通中等教育证书 (General Certificate Secondary Education) 考试中 5 科成绩达到在 C 以上;把英国变成“世界上儿童成长的最佳乐

土”等新目标。

2008 年,英国政府颁布《世界一流学徒制:英国学徒制发展战略 (World-Class Apprenticeship: A British Apprenticeship Development Strategy)》,旨在提升全英国青年人的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促进经济增长。2019 年,英国教育与技能部与国际贸易部联合发布“国际教育战略:全球潜力,全球增长”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 Global Potential Global Growth),旨在提升英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大幅增加国际教育收入。一系列战略行为,进一步强化了其高等教育的中心地位。

## (二) 法国:启蒙运动孕育教育强国

启蒙运动是法国教育强国建设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推动力量。人文主义思想在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大学广泛传播,使得牛津大学、巴黎大学、莱顿大学和海德堡大学闻名于欧洲知识界。优秀大学在启蒙运动中诞生、成长和发展,也助推并扩大了启蒙思想的影响。

中世纪时期被称为“黑暗世纪”,王权与教会长期统治着法国的社会和教育。直到 17~18 世纪,启蒙运动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政教分离制度。法国建立了基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原则和公民共享的公共教育体系。19 世纪初,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法国近现代教育体制——中央集权教育制度应运而生。1808 年 3 月,帝国大学成立,将业士、学士和博士确定为国家级的大学文凭,形成了先进的学位体系,并迅速成为世界大学教育的普遍模式。

战争是影响国家经济兴衰和霸权的一个重要因素。1870 年 9 月,普法战争失败,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被德国取代。面对普法战争失败,法国国内流行着一种说法:“是德国的教师打败或帮助打败了法国军队。”甚至说“普鲁士获胜的设计师是普鲁士的初等学校的教师”。法国进步人士相信:“谁控制了学校,谁就能支配世界”。<sup>[4]</sup> 1881 年,法国制定了体现世俗教育思想的《费

里教育法(Ferry Education Law)》,建立了免费公共义务教育和世俗教育制度。1882—1887年法国教育部颁布一系列相关教育法令,中等学校教育和女性教育得以迅速发展。1919年7月,法国通过《阿斯蒂埃法(Loi Astier Law)》,规定了职业培训班的强制性,即每周至少4小时,每年不得少于100小时。尽管如此,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之争仍长期伴随法国社会发展进程,成为法国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的长期羁绊。

法国大学具有鲜明的国家主义特征。巴黎大学始建于1180年,曾驰名于整个欧洲,被誉为“世界大学”、“大学之母”,学生最多时超过5万人以上。巴黎大革命后,经济社会长期不稳定,法国高等教育一直相对薄弱,社会各界纷纷呼吁建立德国式新型大学。1896年7月,第三共和国颁布《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Law)》,明确规定在全国27个学区原有学院基础上联合组建一所新型大学,享有高度自主权和国家预算经费,大学成为教学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开创了法国现代大学教育的里程碑。<sup>[5]</sup>法国大学涌现出居里夫人(Curie, M.)、李普曼(Lippmann, W.)和贝特洛(Berthelot, M.)为代表的一批顶级科学家。1935—1939年,法国平均每年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数达到1500人,高层次人才培养进入高峰期。

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设立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统一管理国家教育事务。1959年,法国政府颁布《教育改革法案(The Education Reform Act)》,率先实施10年义务教育。在1968年“五月风暴”的影响下,法国推出《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Higher Education Direction Guidance Law)》,提出了大学自治、参与和多科性三大原则,成为自19世纪以来法国高等教育最为深刻的一次改革。进入70年代,法国现代工业和科技发展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1971—1975年,法国政府实施第六个教育规划。1971年,法国颁布了《德洛

尔法(Delol Law)》,将职业培训作为终身教育的核心,该法是世界成人教育史的里程碑。

法国中等教育特别是高中学生规模持续增长,涌入大学的学生数量快速增加。1970—1985年,大学生数量增长了3.5倍。<sup>[6]</sup>1989年7月,密特朗新政府推动由若斯潘(Jospin, L.)提交的《教育方针法(The Educational Policy Act)》,强调:“教育是全民族的首要大事。”1990年1月,法国教育部发布“优先教育区”发展计划,将幼儿至高中教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推进和发展。1991年,法国政府制定了面向21世纪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2000年大学纲要(Schema University 2000)》,明确提出为进入知识经济的竞争做好准备。在知识经济大潮的推动下,法国与英国、德国等一批欧洲国家的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法国高等教育机构注册人数从2000—2001年度的216.03万,上升到2008—2009年度的223.17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上升。2021年法国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为280万人,2026年将达到290万人。<sup>[7]</sup>

为增强法国大学的竞争力,2010年9月,法国政府正式推出“卓越大学计划”(Initiatives d'Excellence, IDEX),目标是到2020年,打造10所世界一流的综合型、研究型大学——这是法国高等教育领域近50年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2019年,法国高等教育署的统计数据表明,法国是全球第六大留学目的国,有35.8万名国际学生,其目标是在2027年接待50万国际学生。<sup>[8]</sup>法国高等教育发展在国际竞争中持续保持质量与规模双重优势。

### (三)德国:屡战屡败唤醒教育强国

与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相比,“德意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遭受到工业文明冲击的‘发展中国家’”<sup>[9]</sup>。在文艺复兴运动中,现代大学发展相继沿着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蔓延开来。16世纪时,德国有42所大学,在校生超过6000人,是当时欧洲大学数

量最多、最密集的国家。与英国原生型现代化“自下而上”的模式不同,德意志在发展模式上采取了一种由国家精英领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沉寂,在18世纪近代大学现代化改革运动的催生之下,德国的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成为“中欧主要的学术和科学中心之一”。<sup>[10]</sup>

1806年,德国明确提出教育救国和教育强国主张。1807年,德国著名教育家费希德(Fichte, J. G.)在《告德意志国民书(National letter to Germany)》中第一个提出了“教育复国”、“教育救国”和“教育强国”的主张。

早在18世纪末,普鲁士就已经以立法推行义务教育,开创了教育史上的一个先例。1802年和1805年,德国巴伐利亚州和萨克森州先后出台初等义务教育法律,成为世界上最早正式实施义务教育的地区。普鲁士教育发展取得骄人的成就:全德小学的入学率由1816年的60%提高到1864年的93%,成为世界教育普及水平最高的国家。1871年,德国的文盲率只有13%,而更早进入工业化时代的英国的文盲率则依然高达30%,法国(24%)也接近德国的两倍。<sup>[11]</sup>

德国在高等学校建设投入巨大财力。1810年,威廉三世任命洪堡(Humboldt, W.)为内务部长,改革普鲁士教育制度,创办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模式”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正式诞生,“洪堡精神”引领一个时代的世界大学。1870年普法战争,普鲁士击败法国,大大提振了国家自信,德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德国成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世界重要的教育中心、学术中心和知识创新中心。英国、美国、日本纷纷借鉴和学习德国高等教育制度与做法。牛津和剑桥大学也曾效仿德国大学加强教授制,美国派遣最有前途的学生到德国留学。德国从一个战争的失败者变成了各国大学追捧和学习的对象。

高层次人才培养始终是德国作为教育强国的重要支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获得诺

贝尔自然科学奖金的共有42人,其中14人为德国学者。法国和英国分别为10人和5人,美国仅为2人。“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德国博士生录取比例一直保持在20%左右。”<sup>[12]</sup>2004年,德国政府推出德国“大学卓越计划”(Excellence Initiative),旨在全面提升德国一流大学建设水平。2007年,德国《高等教育协定2020(Higher Education Agreement 2020)》明确提出,“确保年轻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培养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后备人才,提升德国的国家创新力”<sup>[13]</sup>。目前,“卓越计划”的实施已进入2019—2025年的第三阶段。

#### (四)美国:制度创新引领教育强国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1607年,英国向美国输入永久性移民,并将英国传统大学文化带入美国,为美国大学建设奠定了思想和制度基础。教育战略源于国家战略,国家战略是教育战略的最重要基础和依据。1885年,斯特朗(Strong, J.)曾发表著作《我们的国家(Our country)》并强调:“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所面临的挑战是有史以来最艰巨的,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而实现这个目标,上帝赋予人类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教育。”<sup>[14]</sup>这或许是美国教育强国的最早声音。

1636年10月,马萨诸塞议会开会讨论,同意每年拨款400英镑,仿照英国剑桥大学,筹建一所“新学院(New College),该校成为美国第一所高等学校——哈佛大学的前身,并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标志。在美国强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1700—1820年,北美洲的人口迅速增长,<sup>[15]</sup>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是国家强国建设的基础。二是1776—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以英国失败而告终,从英国人手中夺回了13个州,成为英美强国竞争的战略转折点。三是1892年,美国工业生产总产值超过英国,1900年,实现了GDP世界第一。城镇化率从30%提升为

51.2%。四是19世纪下半期,美国通过赠地法案,形成著名的赠地学院运动,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

与英国、法国、德国相比,美国是国家现代化的“后来者”。1636年,北美第一所私立型高等学院即哈佛学院在美国创立。此后,英国高等教育思想、内容和模式全面主导了美国教育170多年。1815年,哈佛大学校长迪埃弗雷特(Everett, E.)进入德国大学学习,“第一批在美国大学学习的美国人”赴德国大学学习,比较系统地学习和借鉴了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经验。1860年,美国耶鲁大学率先设立了哲学博士学位。19世纪80年代,美国人对德国大学的兴趣达到了顶峰,推崇备至。

“学习借鉴+制度创新”成为美国教育强国建设的实践路径和重要模式。《美国教育史(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的作者克雷明(Lawrence, A. C.)认为:“美国从俄国引进工人培训,从德国引进幼儿园,从英国引进社会安顿体系,然后又连同本土生产的初中学校、实验农场和儿童电视节目等经过改造的、具有美国特色的舶来品重新输出到欧洲。”“美国所有的大学体系都是本国传统和国际传统的结合”。<sup>[16]</sup>美国成为后来居上的教育强国,既善于学习借鉴,更善于制度创新。

19世纪80年代末,普及教育思想基本形成,并作为理想主义教育家的共同追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大学入学规模激增,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从1919—1920年度的597 880人增长到1929—1930年度的1 000 737人,1939—1940年度则进一步增长为1 494 203人。<sup>[17]</sup>美国进步教育运动推进教育公平与发展,成为促进美国教育发展的一种核心力量。据统计,1900—1940年,美国幼儿园入学儿童人数增长了7倍,中学入学人数增长了10倍。<sup>[18]</sup>美国大学规模持续扩大,1949年,高等教育达到15%,成为世界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的第一个国家。在高等教

育发展的拉力带动之下,1965年,美国颁布《初等和中等教育法(The America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of 1965)》,旨在为儿童提供接受公平、公正和高质量教育的机会。1965年,美国高中阶段教育普及率上升到83%以上。<sup>[19]</sup>

完整的教育体系、高质量的人才培养环境、富有竞争力的人才吸引制度,是美国教育的制度优势。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及全球国际秩序建立,美国高等教育创新步伐更加坚定和更加自信。美国大学领导了新一轮的科学革命。“美国真正在高等教育中占据领导地位还是在二战以后,这与美国的国家政策相关,一流大学的建设同国家的安全与发展紧密结合。美国的政治、经济霸权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以其学术优势和科技优势为基础的。”<sup>[20]</sup>1946年,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1948年,该委员会发布《为了美国民主的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 for American Democracy)》报告,指出高等教育应该成为“每一个公民、青年和成人有能力、有勇气继续学习的手段”。1947年美国高等学校招生规模为230万人,1960年增长到460万人,1970年在校生规模为860万,1980年达到1 210万。<sup>[21]</sup>1971年,美国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再一次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的翘楚,利用其大学的制度优势和质量优势,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1901—2020年,美国共有386人次获得诺贝尔奖,英国134人次,德国108人次,法国70人次,分列第一至第四名。近年来,在世界大学的激烈竞争中,美国有11所大学进入2019—2020年大学排名前20名,有31所学校进入百强,总体排名略有下降。

## 二、典型经验:世界教育强国优势比较分析

教育强国的演进发展是一个充分发挥优势进行激烈竞争的过程。经历长期探索,作

为现代化先发国家的英国为后起之秀积累了失败与成功的经验。法国、德国、美国处于后来者的地位,学习借鉴、国家干预、政府推动和制度创新成为其教育强国发展的必然路径选择。

#### (一)率先探索与学习互鉴的成功路径

从历史视角分析,在教育强国建设和演进的曲折历史进程中,欧洲在知识创新方面逐步呈现下降趋势。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的教育强国之路时快时慢,艰难前行。英国崇尚自由市场经济,教育政策和教育发展易于受到政治、经济、市场的影响。英国高等教育长期精英化模式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限制了英国作为高等教育中心的作用的发挥。

英、法、德、美四个国家的教育强国经历是一个充满战争与反战争、竞争与反竞争、争夺与反争夺、超越与反超越的历史过程。德国曾经被法国打败,而又打败了法国,并超越了法国;美国曾经先后打败了英国和德国,实现了对其国家实力与教育竞争力的超越。19世纪中叶,德国拥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柏林大学独领风骚近百年,几乎无校可与之匹敌。1901—1950年,73%的诺贝尔奖得主来自现在的欧盟国家。其中,德国有3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排名世界第一,科技中心和教育中心的地位明显。而在1946—2010年,美国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为270人,名列第一;德国为35人,名落第三,与美国差距拉大。教育强国优势迁移、地位转换成为一个常用态。

在世界教育强国演进的历史长河中,各国之间既有相互的博弈与竞争,更有相互的借鉴与学习。从形成模式上分析,1960—1970年,美国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后发优势,实现对英国和德国的战略追赶。从根本上讲,善于学习、不断创新是美国教育强国建设更胜一筹的根本之策。正因如此,从1971年美国率先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之时起,其高等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水平持续50年处

于全球最领先地位。

#### (二)自然成长与政府推动的演进模式

世界教育强国形成和演进的经验证明,经济发展是教育强国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顺势而为则是世界教育强国成长的重要经验。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成为世界教育强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法国和德国成为教育强国;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成为世界教育强国;第四次工业革命,即知识经济社会,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再一次抓住机遇,强化和巩固了其世界教育强国的战略地位。世界教育强国是一个适应潮流、应运而生的“自然成长”过程。

世界教育强国的行为和演进轨迹是一个不断在发展中调整、在调整中发展的持续过程。英国长期奉行高等教育高度精英化策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学术发展与高等教育政策方面长期垄断英国高等教育。直到1828年,伦敦大学、国王大学和杜伦大学相继诞生,打破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统天下的格局。为加强与其他国家的战略竞争,在教育强国建设之路上,政府又时不时地冲在“市场”前面。一路走来,英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思想、发展模式和发展速度等方面常常会呈现政府的积极规划与高等学校消极行动之间相互矛盾。

英国高等教育长期坚持精英教育策略,普及水平低严重制约着英国高等教育的强国地位。由于1960年的学生运动和1970年的石油危机、政府更迭以及缺乏稳定的机制和政府执行力,英国高等教育长期“匍匐前进”,1990年的毛入学率仅为30.2%,处于低水平大众化阶段。1991年,英国政府发布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高等教育新框架(白皮书)(The Framework for Higher Education —— UK Higher Education)(White Paper)》,改变了延续数百年的“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采取更加积极的“教育计划的控制”,采取经费控制的强力手段,把握高等学校办学方向、发展模式和发展

速度,在新的历史时期成功实现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跨越发展和普及化。

美国则比较成功地运用政府、民间与社会方面的多种力量推进和建成教育强国。克拉克(Clark, B.)曾提出一个广为引用的“高等教育协调三角”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有三种力量在影响着高等教育:国家权威、学术寡头和市场机制。<sup>[22]</sup>美国率先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战略逻辑和发展逻辑,成为直接影响美国人口文化素质的重要推手。1900年,美国全国人口中只有4%进入高等学校学习,2000年上升到43%,2020年更接近50%。美国人力资源的质量和竞争力持续提升,成为美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优势。

### (三)学术强国与技能强国的目标追求

教育强国具有双重内涵,一是学术强国,二是技能强国。前者目标是知识创新,后者目标则是产业创新,而其共同的使命是培养强国人才。在提升教育强国竞争力方面,英、法、德、美四国政府几乎均采取了两种策略:一是扩大学术资格的选择性,建设更好的研究型大学,整体提升高等教育的学术水平;二是坚持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建立高质量、高标准的职业资格体系,实施高水平学徒制,为经济增长提供可持续动力。

创造知识、追求真理是大学重要的学术使命,更是教育强国的核心竞争优势。统计表明,英国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1%,从事世界5%的科研工作,发表占世界9%的学术论文,引用量则高达12%,获得各种国际大奖人数的比例则占世界10%以上。哈佛大学是具有广泛社会声誉的世界顶级高等学府,共产生16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德国、法国同样也长期引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极大增强了国家的软实力。

技能强国是发达国家教育强国建设的共同目标追求。早在1562年,英国就颁布了《工匠学徒法(The Craftsman Apprenticeship Act)》,成为世界教育体系发展进程中最早用

国家法律武器来保障学徒制实施的国家之一。德国“二元制”将传统的“学徒制”与现代职业教育模式相结合,创立了教育强国建设的“德国标志”和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德国经验。1969年,德国《职业教育法(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Law)》构建起“二元制”职业教育新体系。2020年,德国约有46.5万青年人签订“二元制”职业教育合同,足以证明其制度活力和竞争能力。

同样,英国政府一直把改革技能供给作为国家优先战略领域,多年来连续出台一系列技能强国建设的国家战略。《2008年教育与技能议案(The Education and Skills Bill in 2008)》被认为是英国50年来最为重要的教育立法,它致力于在5年后将国民的义务教育年龄提高到18岁,保证每一所学校都是优质学校。面对教育信息化的时代潮流,2009年10月,英国就业和技能委员会发布《2020目标:发展世界一流的技能和工作(2020 Goal: To Develop World-class Skills and Jobs)》政策报告,努力实现技能开发体系的连贯性、平衡性、整体性和终身化的战略目标。2016年4月,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发布了《面向数字化知识社会的教育行动(Educational Action for the Digital Knowledge Society)》,明确提出实施“职业教育4.0”框架倡议(Vocational Education 4.0 Framework Initiative),实现职业教育教学内容与培养方式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保持技能教育、技能开发、技能应用和技能贡献的世界一流水平。2018年10月,美国白宫发布《先进制造业美国领导力战略(Educational Action for the Digital Knowledge Society)》,旨在恢复美国在先进制造业的全球重要地位。

### (四)制度创新与国家竞争的战略优势

世界教育强国形成的内在推力源于教育制度创新。美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时期。第一次发生在1860—1880年,美国联邦政府于1862年通过了“莫利尔赠地法



案”(The Morrill Land Grant Act),“赠地学院”(Freeland College)模式使得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异军突起,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的过渡便显得极其容易。”<sup>[23]</sup>1876年,仿效德国大学模式而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宣告了现代研究生教育制度在美国的诞生,在继承英格兰、苏格兰和德国大学制度基础上,美国大学逐步发展壮大。“在大国成长的道路上,美国很早就成为教育大国。”<sup>[24]</sup>

第二次大战后,美国迈入世界强国行列,并成为教育强国领头羊。在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美国政府富有创新性的战略举措包括:颁布和实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1944)》(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朝鲜战争复员军人法(The Korean War Restoration Veterans Law)》(1952年)以及《复员军人再适应利益法(Retired Soldiers to Adapt to the Interest Law)》(1966年)。战争之后将军队人才迅速地转变为建设人才,既维护了社会稳定,迅速进入建设时期,又加快实现了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制度创新,把数百万退役军人全部送入大学作为一种战略性投资,同时解决了战争“综合症”和人力资源开发两大问题。

社区学院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的最好例证。20世纪60年代“全民上大学”运动掀起了美国第二次教育革命的浪潮。1965年,《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Law)》出台,加强了联邦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各州普遍建立社区学院,开创了高等教育地方化的新模式,对于美国高等教育在全球率先实现普及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70—2016年,各级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从850万增长到2050万,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向地方化的转换过程中,社区教育做出重要贡献。

教育战略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应对国家教育战略危机、转变发展模式的重要政策工具。美国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教育战略,保障国家战略安全,提升国家战略

竞争力。1983年,美国发布《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A Nation at Risk: 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al Reform)》报告后,布什总统又于1991年签发了《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The American Education Strategy for 2000)》,提出了迈向21世纪美国教育六大战略目标。1993年,克林顿政府颁布《2000目标:美国教育法(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继续推进美国教育改革,将六大目标拓展为八大目标。2002年,小布什政府签署《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提出要让每一位美国公民都能享受良好教育,成为符合美国未来需要的合格公民。由于“9.11”事件的发生,美国教育部根据新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对《2001—2005年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 for 2001—2005)》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于2002年制定出《2002—2007年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 for 2002—2007)》。倾举国之力,持续推进战略性竞争是美国发展和维持教育强国地位的一项重要举措。

### 三、转危为机:世界教育强国风险应对之策

国运兴衰和国家生命力呈现周期性变化,既有确定性,更有许多不确定性。教育强国的成长之路充满曲折、艰险和挑战。世界各国相继在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直面危机,各自采取不同的应对之策。

(一)领跑者的迷茫:英国教育强国进程中的挑战应对

早在1949年,美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率先达到15%。1971年,其入学率首次突破50%,再一次率先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在欧洲国家长期陷入“精英教育的泥潭”时候,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国地位更加巩固。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欧国家长期实行精英高等教育并没有换来教育与人才培养的优势,反而在优秀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方面更加落后于

美国。过高的门槛,使得青年人不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压缩了高层次人才的培养规模,更挤压了欧洲各主要国家作为世界教育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特罗(Trow, M.)认为:“在欧洲,危机是由于从精英式大学向大众高等教育系统转化不完全而产生的”。<sup>[25]</sup>

英国持续推进教育改革,以保持其在国际教育中竞争力和优势地位。1991年,首相梅杰(Major, J.)上任伊始,就发布英国教育白皮书《21世纪的教育和训练(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the 21st Century)》,指出:“过去10年来,英国的教育和训练经历了一场革命,政府已开始支持这场影响深远的改革,并增加了投入”<sup>[26]</sup>。在提升教育竞争力方面,英国政府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扩大学术资格的选择性,建设更好的大学,全面提升英国教育的学术水平。另一方面,坚持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地位优先,成立全国职业资格委员会,首推国家职业资格框架,努力建立一个高质量、高标准的职业资格体系。

从现代工业革命开始,英国教育尽管有时发展迟缓,但始终是世界教育发展的重要支点和重要引擎,其作为世界教育强国的地位没有改变。英国拥有世界先进的高等教育体系,20世纪以来,英国一流大学建设稳居世界第二,始终跟随美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重要强国。2020年,进入全球前200的高等学校,有31所是英国大学,其中19所大学的排名有明显的下滑。尽管英国教育与科技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但其作为世界教育中心和科技中心的地位依然保持。英国政府提出在未来5年,国际留学生将进一步增长15%~20%,以扩大英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二)思考者的彷徨:法国教育强国进程中的挑战应对

1968年春,“西方世界的大学被前所未有的学潮所淹没”,法国“五月学潮”极大地冲击着法国社会特别是整个高等教育体系。同

年11年,法国高等教育改革,传统的院系机构被取消,代之以“教学研究机构”,一种自治性更强、参与度更高、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大学新体制逐步建立,由此成为一场最深刻的大学改革。1973年爆发的世界石油危机贯穿整个20世纪70年代,并延续到80年代初期。“由于教育系统与迅速变化的周围世界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协调,旧的危机更加严重,而且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又产生了新的危机。其中最主要的是现在对教育自身产生了信念危机。”<sup>[27]</sup>这种危机带来的挑战与风险在欧洲更加严峻。作为欧洲乃至世界教育强国,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国家行动,努力强化教育发展的国家战略,加大教育发展投入,积极应对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对教育的挑战,克服青年就业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压力。

为进一步提振法国教育竞争力,法国政府颁布《2011—2014年法国国家改革计划(Programme National de Reform de la France 2011—2014)》,促进学生流动,加快综合大学合并改革。2013年6月,法国政府通过《重建共和国基础教育规划法》,针对教育质量下滑现象,对教育改革进行顶层设计,启动新一轮基础教育改革。2020年,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法国中小学校利用高水平信息化手段,推进教育内容与教育模式改革,努力克服逆全球化危机,扩展国际教育空间,确保法国的教育强国地位。

(三)失败者的奋起:德国教育强国进程中的挑战应对

从长周期观察,德国发展道路充满曲折、坎坷与分裂,甚至曾经分裂为360个小邦国,1990年方才实现真正统一。德国国际教育地位的衰落,不仅与其教育发展有关,更关乎经济社会的发展。德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此后的高等教育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是1945年至20世纪50年代的重建时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二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改革时期,

以石油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为标志。三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至2004年的调整时期,以探索欧洲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为标志。四是2005年以来的恢复振兴时期,以知识经济背景下高等教育普及化为标志。与美国1971年代初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高等教育竞争力持续提升相比较,1970年成为德国高等教育竞争力下降的重要拐点。社会危机特别是学生运动导致德国教育危机,德国教育竞争力和影响力逐步减弱。

在工业化后期,德国高等教育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徘徊状态。德国高等教育中心地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20世纪70年代末,发达国家整体教育发展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以致出现了1980年教育体系注册人数的增长为零的教育现象。1982年,美国大学从社会和企业得到的研究经费占大学研究经费的比例高达77%,法国为48%,日本是25%,联邦德国仅为21%。1987年,联邦德国研究联合会支出的资金为6.41亿马克,仅比1975年增长3200万马克。由于人口、经济、财政和就业等原因,1990年,德国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回落到1970年的水平。但是,伴随着出生人口规模下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依然有所提升。1975年,联邦德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0.2%,1990年仅为28.3%。

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知识经济(The Knowledge Economy)》报告,与英国、法国一起,德国政府加快发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迅速突破50%进入普及化阶段。2005年,德国开启了新一轮一流大学建设浪潮。2018年,德国推进“职业教育4.0”(Vocational Education: 4.0)计划,全面实现职业教育的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再次引领世界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

(四)胜利者的恐慌:美国教育强国进程中的挑战应对

美国教育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日渐增长,逐步成为世界第一教育强国。库姆斯

(Combs, P. A.)将其称为“建立在教育金字塔里的发达国家。”而危机意识是美国国家发展特别是教育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表现,美国政府和学者十分善于发现、制造和利用战略危机,凝聚国家意志,调动全民力量,推进美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成功地让战略危机变成最大的战略机遇。

美国是一个始终保持危机感、化危机为机遇的教育强国,关键时刻的战略转机成为教育中心演进的重要影响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长期对苏联实施遏制政策,核武器的数量从1948年的50件增加到1953年的1350件,美国政府和人民自认为对苏联处于长期的战略优势。1949年,苏联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1957年,又成功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从根本上打破了美国的军事技术垄断。美国政府、社会和学界反思检讨,国会议员提出了近1500项涉及教育的议案,认为美国在科技上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教育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出了问题。

1958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教育法(The National Security Education Law)》,旨在提高全民族国防素质和国防观念,采取增加教育经费、建立教育资助制度、培养天才青年和发展师范教育等重大战略措施。每年拨款10亿美元用于发展教育,保证一切孩子不因家庭困难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该法的制定从法律上再一次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教育强国和全球教育中心的地位。1960年,美国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比20世纪初提高了80多倍,其高等教育机构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大学教授和学生占世界三分之一。一个教育强大的美国,最终支撑着美国成为一个政治强国、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外交强国和军事强国。

当时美国政府和学者所感受到的教育威胁不仅来自社会主义苏联,也来自日本、韩国和德国的教育变革。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新一轮教育改革更加关注教育质量。1981

1991—2021年美国教育强国战略列表

年份	战略名称	关键内容
1991	《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The American Education Strategy for 2000)》	提出面向21世纪美国教育四项战略和六大国家目标。
1994	《2000目标:美国教育法(Goals 2000; Educate America Act)》	提出全国教育改革计划,重申2000年教育发展目标。
2001	《2001—2005年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 for 2001—2005)》	为所有儿童的学习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改革体系、提高质量,将教育部建成有绩效组织。
2002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is Left Behind)》	体现了21世纪美国公平教育思想的创新。
2002	《2002—2007年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 for 2002—2007)》	教育服务于国家战略利益,以平等服务卓越,将文化、科研、管理作为追求“卓越”的保障。
2007	《战略规划2007—2012(Strategic Planning 2007—2012)》	通过加强优质教育和保证教育公平,提升学生学业成绩,为全球竞争做好准备。
2014	《2014—2018财年美国教育战略规划(American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 for Fiscal Year (2014—2018))》	奥巴马政府提出“至2020年,美国大学生毕业率世界第一”的总目标。
2018	《美国联邦教育部战略规划(2018—2022)(The Strategic Planning of the Federal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8—2022))》	培养人人成功且具有全球胜任力的人才。
2018	《制定成功路线:美国的STEM战略(Charting a Course for Success: America's Strategy for STEM Education)》	确定美国STEM教育的五年愿景,实施“北极星”计划,将美国打造成STEM扫盲、创新和就业的全球领导者。
2019	《美国人工智能计划(American AI Initiative)》	制定了投资研发、释放资源、制定标准、培养人才、国际合作等五个方面的战略部署。
2022	《2022年美国竞争法(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	旨在提高经济和国家安全领域的竞争力。

注:本文作者根据网络有关文件整理。

年,美国成立了“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1983年,该委员会提交了《国家处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The Country is in Crisis: Education Reform is Imperative)》的调查报告,指出“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危急之中。我们的商业、工业、科学和技术创新方面往日不受挑战的领先地位,正在被全世界的竞争者赶上”。报告深刻分析到:美国17岁学生理科成绩连续下滑,“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超过、不等于、甚至达不到他们家长的教育技能,这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正在培养一代科学和技术方面的文盲。美国政府、学界和社会意识到:“教育比建立最好的工业系统或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重要”<sup>[28]</sup>。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始终将人才作为教育强国建设进程中最为重要的战略支撑。1900—1930年的30多年中,全世界90多个诺贝尔奖得主中,美国只有4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实施了“回形针行动”,美国战略情报局把超过1600名纳粹德国科学家和高层次技术专家带回美国,美国科学技术发展大受裨益。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调查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德国每年有约4万名科研

人员赴美国从事研究工作,其中约3000人选择在美国长期居住。<sup>[29]</sup>2012年11月,美国联邦教育部发布《通过国际教育与国际参与制胜全球(2012—2016)(Succeeding Globally Through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ngagement 2012—2016)》,提出两大战略目标:加强国际教育是美国的国际优先事项,为学生提供国际化教育,培养所有学生的全球胜任力,积极推进教育外交。2019年,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华裔科学家大约有3.2万人,占美国科学家总数的13.7%。世界人才汇聚于美国,极大地增强了其科技实力和人才竞争力。

#### 四、未来趋势:世界教育强国追求卓越之路

建设教育强国是一条曲折之路、竞争之路和卓越之路。英、法、德、美四大教育强国,继续拓展和发挥其战略领跑与人才高地优势,巩固其教育强国地位,进而实现长久维护其作为世界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和军事强国的地位。

一是以国家名义制定教育卓越计划。为适应世界高等教育质量竞争和一流大学建设

趋势,2006年,德国政府启动著名的“卓越计划”(Excellence Programs),即《联邦与各州促进德国高校科研发展的卓越计划(Federal and State Excellence Programs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German Universities)》,重点包括以卓越科研人才培养为目标的“研究生院”、代表顶尖科研领域和科研团队的“卓越集群”和扩展大学整体科研优势的“未来构想”三大战略项目,旨在“持续加强德国科研实力,提高国际竞争力,突出大学和科研领域的顶尖优势”,在德国打造若干所“哈佛大学式的精英大学”,提升德国大学在世界高等教育和科研中的地位,吸引世界范围内的优秀人才在德学习和工作。

发达国家“卓越计划”交错而行。2008年,英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发布的《2008—2011年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 for 2008—2011)》,确定了未来一个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六大战略目标:追求教与学的卓越;扩大参与和机会公平;提升研究卓越水平;扩大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经济的贡献;举办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保证卓越。以卓越为标志,整体提升培养学术精英人才水平,成为世界教育强国发展演进的新主题和新动力。2012年6月,德国政府推进的精英大学创建工程——“卓越计划”第二轮评选揭晓,慕尼黑大学等11所大学入选卓越计划子项目——“未来构想”,成为德国精英大学的代表。<sup>[30]</sup>2013年,在《罗宾斯报告(Robbins Report)》发表50年后,英国政府发布《再看〈罗宾斯报告〉:规模更大,质量更高的英国高等教育(Robbins Revisited: Bigger and Better Higher Education)》报告,明确提出,为适应2021年起大学适龄人口将持续上升的趋势,逐步增加大学学习学位,到2035年,英国升入大学的学生数量将达到62万人,以满足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

二是强化技能强国的战略竞争优势。进入21世纪,持续技能开发是教育强国的不改

初衷。2017年1月,美国联邦教育部发布《国家高等教育技术规划(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Technology Planning)》,并成立高等教育共同体,以技术变革支撑高层次人才资源开发,促进学习者的学业成就与社会成就。2018年,德国政府发布《2018年职业教育报告(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port for 2018)》,首提“职业教育4.0”(Vocational Education: 4.0)理念,以数字化课程、数字化技能和数字化管理为主要内容,旨在推进和提升德国职业教育的竞争力。通过“职业教育4.0”,德国将继续引领世界职业教育发展。

三是再造教育信息化的领先地位。为持续保持教育强国的领先地位,2015年5月,法国正式确立“数字化校园”教育战略规划,明确提出全法初中学生个人移动设备实现全覆盖。2019年,英国教育部发布的《教育技术战略:释放技术在教育中的潜力(Education Technology Strategy: Realising the Potential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提出,支持教育行业开发新技术,提升教学效果,缩小数字鸿沟;提供高质量的技术产品,满足教育需求,稳固英国教育技术的国际领先地位。2020年9月,欧盟颁布《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 2021—2027)》,描绘了数字教育的愿景,旨在建立适应数字化时代发展的教育和培训系统,实现更加有效、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发展。2019年,《美国人工智能计划(American AI Initiative)》明确将培养人工智能时代的研究者和“培养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力”作为双重优先领域。2020年,德国联邦教研部与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和莱布尼兹教育研究与教育信息研究所共同发布了《德国2020年教育报告(The German Education Report for 2020)》,在总结教育发展成就的同时,提升教育数字化能力,推进德国教育数字化进程。2020年,在硕士和博士的比例占在校生规模的40%以上,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处于

领先水平。

四是持续扩大教育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尽管逆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教育强国始终将教育国际化作为教育强国的重要支点。2018年11月,法国政府公布高等教育吸引留学生的新战略,提出到“2027年接收50万留学生”的目标。2019年3月,英国政府出台的《国际教育战略:全球潜力、全球增长(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 Global Potential, Global Growth)》提出,到2030年,将英国教育出口总额扩大到每年350亿英镑,国际学生规模增长30%,从2018年的近46万人提高到每年60万人。<sup>[31]</sup>2021年,英国政府又发布《2021国际教育战略升级——支持复苏、驱动增长(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 2021 Update: Supporting Recovery, Driving Growth)》报告,推动国际教育从复苏转向可持续增长,努力实现两大目标,确保实现英国2030国际教育战略。伴随着国际教育竞争,世界教育包括教育强国仍将不断演进和持续发展。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政治、科技与军事力量对比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时期,国际环境和大国竞争日趋激烈,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权力中心转移理论认为,社会周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Tovler, J.)在《第四次浪潮(The Fourth Wave)》中预示:“我们正在目睹着一次文化、经济、政治权力由大西洋向太平洋的全球性大转移”,“从纽约——伦敦——巴黎轴心到洛杉矶——东京——北京轴心的转移”。<sup>[32]</sup>从教育发展历史特别是世界教育中心形成和变迁过程来看,有其内在的演进历程和发展逻辑。

面对世界经济强国和教育强国的形成与发展,金德尔伯格(Kindelbergh, C. P.)断言:“世界经济是一系列集中和再集中的过程,期间可能还夹杂有中心的丧失”。<sup>[33]</sup>这种文化、

经济、政治权力中心的转移,是中国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面临的最大战略背景和战略机遇。我国是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和亚太文化的主要代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崛起,必将出现中华文化的复兴。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教育强国将持续发展演进,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将进一步深刻改变世界教育强国的格局。

#### 参考文献:

- [1] 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79.
- [2] 黄兴胜. 近年来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特点、趋势及启示[J]. 世界教育信息,2019,(7).
- [3] 吕达,周满生. 高等教育的框架——英国高等教育白皮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4.
- [4] 滕大春. 外国教育通史(第四卷)[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 23.
- [5][12] 陈学飞,等. 西方怎样培养博士——法、英、德、美的模式与经验[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23—24,14.
- [6] 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 国际教育纵横——中国比较教育文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230.
- [7] 法国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将持续增加[J]. 世界教育信息,2018,(13).
- [8] 法国成为世界第六大留学国[EB/OL].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3291617>.
- [9] 李工真. 现代大学的由来[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3,(9).
- [10] 贺国庆. 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25.
- [11] 于建福. 德国基础教育概览[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7. 9.
- [13] 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 (BMBF). Ver-waltungsvereinbarung zwischen Bund und Ländern über den Hochschulpakt 2020 von 20. August 2007 [EB/OL]. [http://www.bmbf.de/pubRD.werwaltungsvereinbarung\\_hochschul-pakt2020.pdf](http://www.bmbf.de/pubRD.werwaltungsvereinbarung_hochschul-pakt2020.pdf).
- [14][16][18][21] 劳伦斯·A·克雷明. 美国教育史(3):城市化时期的历程(1878—1980)[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2—23,12,259,277.
- [15] 安格斯·麦迪森. 世界经济千年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1.
- [17] Oliver, C. Carmichael, Universities: Commonwealth and American Century America[M]. Cambridge City:Harvard University, 1965. 32.
- [19]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NCES). The Condition of Education 2019[EB/OL]. <https://nces.ed.gov/programs/coe/>.

[20] 闵维方. 关于一流大学建设的几个问题[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3, (3).

[22] 伯顿·R·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156.

[23] 天野郁夫. 高学历社会的大学[M]. 东京: 东京大学出版社, 1976. 35.

[24] 郭宇立. 美国的大国成长道路[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43.

[25] 马丁·特罗. 从大众高等教育到普及高等教育[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03, (4).

[26] 21世纪的教育与训练——英国政府白皮书[R].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5.

[27] 菲利普·库姆斯. 世界教育危机[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6.

[28] 夏之莲. 外国教育发展史料选粹[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207, 213.

[29] 2000年以来德国每年有3000科技人才流向美国[EB/OL]. <http://news.sohu.com/20050814/n226665424.shtml>.

[30] 德国精英大学创建: “卓越计划”第二轮评选揭晓[EB/OL]. [http://www.nies.net.cn/ky/jypl/pl\\_ywzz/201209/t20120907\\_306212.html](http://www.nies.net.cn/ky/jypl/pl_ywzz/201209/t20120907_306212.html).

[31] HM Government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DF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y: global potential, global growth[EB/OL]. <https://dera.ioe.ac.uk/33009/>.

[32] 约翰·托夫勒. 第四次浪潮[M]. 北京: 华龄出版社, 1996. 1.

[33] 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著. 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7.

##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Powers in the World ——Taking the UK,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S for Example

*Gao Shuguo*

**Abstract:** An education power indicates a country with a prominent position and a strong influence in terms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strengths, the ability to cultivate talen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The UK,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S, which are education powers in the world, have different processes of development but similar destinations. Owing to their similar sources of culture and value, they hav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and similar features; owing to their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they have different, diverse and competitive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key elements and events of the world'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various countries, four dimensions for the building of an education power (core elements, practical paths, mechanisms of evolution, and typical experience), and four stages in the building of an education power (early incubation, energy accumulation, innovation and growth, and the achievement of transcendence),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typical experience, strategic advantages and reactions to risks in the evolu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 education power, and makes an exploration into the logics of history, practice, theories, and the future for the building of an education power, so that we can have a more accurate and mor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 for the evolution of an education power and the future approaches in pursuit of excellence, and provide experience and models for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building of a modern socialist education power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education power; mechanism for formation; typical experience; competition trend

**Author:** Gao Shuguo,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hinese Society of Education, and senior researcher (Beijing 100084)

[责任编辑:李红恩]